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E SOCIAL ROLE OF THE MAN OF KNOWLEDGE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Florian Znaniecki

[美国]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著 郑斌祥 译 郑也夫 校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Florian Znaniecki

[美国]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著 郑斌祥 译 郑也夫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 (美国) 兹纳涅茨基著; 郑斌祥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6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2698-6

I. ①知… II. ①兹… ②郑… III. ①知识社会学
IV. ①C91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3774 号

书 名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作 者 [美国]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译 者 郑斌祥
责任编辑 陈 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5
插 页 2
字 数 129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2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698-6
定 价 2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圈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新版导言

刘易斯·A.科塞

十五年后,当重读我在一九六八年为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所作的导言时,我不禁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当时我只是靠在深夜里的口哨声来鼓舞自己的。我仿佛觉得,在讨论知识社会学从马克思—曼海姆—舍勒的德国传统到以埃米尔·迪尔凯姆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为代表的法国传统的各种不同观点时,为了争取读者,使他们关心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强调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在实际的研究成果仍然相当少的时候也应如此。尽管我曾信心百倍地试图向人们表明,知识社会学充满生机,在国内外日趋活跃,但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的评价过于乐观。总的来说,这一研究很有希望,但是实际进展却不大。

这并不是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没有实实在在的进展。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的《参悟柏拉图》^①、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大部分著作^②,以及我自己的《理念的

① 古尔德纳:《参悟柏拉图:古希腊与社会理论的起源》(*Enter Plato: Classical Greece and the Origin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

②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以及大部分其他著作。

人》^③证实了下列事实:知识社会学能够唤起作者的灵感,写出具有重要意义的论著。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兴趣开始复兴,这一现象表明,米尔斯和古尔德纳等人的著作并非昙花一现,它已经为知识社会学传统的真正复兴翻开了历史的篇章。首先,迟迟才得以出版的卡尔·曼海姆的某些早期著作^④,对知识社会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与所谓的《巴黎手稿》在三十年代的出版相媲美,后者可以用来重新评价卡尔·马克思的著作。

其次,由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⑤及其弟子们的开创性工作,以及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⑥对这个学科的创造性贡献,科学社会学迅速发展,明显地激发了人们对其他文化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兴趣。

第三,经过诸如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和伊姆利·拉卡托斯^⑦(Imre Lakatos)等学者的努力,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得到了发展,这

③ 科塞:《理念的人》(*Men of Idea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④ 曼海姆:《思维结构》(*Structure of Think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由戴维·凯特尔(David Kettle)、沃尔克·迈耶(Volker Meja)和尼柯·斯特尔(Nico Stehr)合编并作序;曼海姆:《保守主义》(*Konservatismus*, Frankfurt, Suhrkamp, 1984),由凯特尔、迈耶和斯特尔合编并作序。也可参见迈耶和斯特尔主编的《知识论争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Dispu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⑤ 默顿:《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⑥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第2版,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⑦ 图尔明:《人类理解》(*Human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也可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 with 科学理论》(Barry Barne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米切尔·马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Michael Mulkey,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9)。

为接受曼海姆和迪尔凯姆的思想创造了可能性，而在传统逻辑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时候，后两个人的思想在科学哲学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不再觉得科学思想的起源——不同于科学思想的证实——是相当偶然的，因而不大容易进行社会学分析。相反，他们现在主张，科学思想的起源与证实二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可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解释；思想并非产生于社会真空。

除了思想界的这种变化外，最近出现了几部杰出的著作，充分显示人们对知识社会学产生了新的兴趣。米尔斯和古尔德纳的工作成了年轻一代社会学家的典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向古尔德纳创办的《理论与社会》杂志投稿。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纵向分类》^⑧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道，“高”与“低”、“之上”与“之下”以及“上”与“下”这些概念，除了空间含义之外，都是附有道德意义的精神构成，因此，所谓“之上”或“更高”，意指一种道德优越感。同样，埃维塔·齐鲁巴维尔(Eviator Zerubavel)在他的《隐秘的韵律》和《七天一周》^⑨两本书中，以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向人们表明，在构造社会世界时，时间与时间推算是如何成为中心参量的。他们制定了一些明确的标志，以识别所有社会生命。迪尔凯姆肯定会赞同他们。在人类学中，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⑩在社会分类方面的工作，以及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viii

⑧ 施瓦茨：《纵向分类：关于结构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的一项研究》(Vertical Classification: A Study in Structur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⑨ 齐鲁巴维尔：《隐秘的韵律：社会生活中的时间表与日历》(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七天一周：星期的历史与意义》(The Seven Day Circle: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Week,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⑩ 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褻渎和禁忌概念分析》(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⑪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 1958)。

Strauss) ①等人的几乎所有结构人类学著作,都建立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严格地说,这些观念可以在迪尔凯姆和莫斯的《原始分类》^②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③中找到。

我很愿意向人们指出,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所播下的种子,在瑞雪之下经过长时期的蛰伏之后,同样开始破土而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茁壮成长。默顿早就熟悉兹纳涅茨基的著作,并在几种作品中讨论和应用过他的理论^④,我想,黛安娜·克兰(Diana Crane)在她的科学社会学^⑤及对其他文化现象的分析中,也可能受到了兹纳涅茨基的影响。但是在美国,兹纳涅茨基的理论显然没有曼海姆或迪尔凯姆的理论兴盛。不过,至少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在努力形成或重建兹纳涅茨基在知识类型与接受这种知识的集团类型之间作出的某些区分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步兹纳涅茨基后尘的。^⑥

我希望这一新版将有助于扩大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位提出和接受思

② 迪尔凯姆与莫斯:《原始分类》(*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③ 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47)。

④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增补本,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3),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章。

⑤ 克兰:《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⑥ 马林斯:《当代美国社会学的理论与理论群体》(Nicholas C. Mullins, *Theories and Theor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L.T. 雷诺兹与J.M. 雷诺兹:《社会学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J. McKay, 1970),尤其是霍罗威茨(Irving Louis Horowitz)的论文:《主线与支流:社会学理论的人类形象》(*Mainliners and Marginals: The Human Shape of Sociological Theory*),第340—370页。也可参见科塞:《寻找本体的两种方法》(*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a Substance*),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0, December 1975),第691—700页。

想的理论家的声望,并在不久结出果实,可以同紧随迪尔凯姆和曼海姆所结出的果实^①相媲美。兹纳涅茨基在美国合作写出的第一本重要的社会学研究专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我认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具有与之相媲美的价值。现在是时候了,那些长期以来在公开场合诋毁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使用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使用兹纳涅茨基成果的人,应该从密室中钻出来,像莫里哀的《资产阶级贵族》那样坦率地承认,他们一直在使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尽管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ix

^① 对德国和法国知识社会学的当今趋势所作的精彩介绍,请参见斯特尔和迈耶编的《社会与知识》(*Society and Knowledg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4)。

一九六八年版导言

刘易斯·A.科塞

一本富有创见却长期被忽视的著作《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出版了,作为两个不同国家(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之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理应获得这一殊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国波兰,社会学还没有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兹纳涅茨基几乎单枪匹马,创立了经验研究的传统,对农民和工人的自传体生活史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创建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了《波兰社会学评论》杂志。兹纳涅茨基及其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是目前波兰社会学飞速发展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些,社会学在波兰的发展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一九四〇年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这些时间里,兹纳涅茨基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发现了一门业已繁荣发展的社会学学科,并与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威廉·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亲密合作。他对成熟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作出了如此独特的贡献,以至必须同时称他为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兹纳涅茨基生于一八八二年,那时的波兰,他的出生地还被德国人占领着,他的父亲具有上流社会的血统,当他还是几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把财产耗费殆尽,后来在俄国占领波兰时只是作为财产经营者度

过余生^①。在历经华沙、日内瓦、苏黎世、巴黎和克拉科夫的大学学习之后，兹纳涅茨基一九〇九年在克拉科夫获得博士学位。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因而第一批著作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尽管他已经显示出对伦理学的社会根源具有强烈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兹纳涅茨基遇见了威廉·托马斯。托马斯来到波兰，研究波兰农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这一课题与他对美国的波兰移民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有关。托马斯力劝兹纳涅茨基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这项研究，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结出了硕果，出版了不朽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②，即使在美国，这也是第一项重要的经验性社会研究。理论导向与新奇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之间创造性地交相辉映，使这本书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著之一。

自从与托马斯合作之后，兹纳涅茨基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然而，他在哲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尤其是价值理论，明显地反映在社会学著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出这一点。兹纳涅茨基勤于劳作，极其多产。我无法一一涉及他以波兰文发表的九部著作，或用波兰文写成的大量文章。在用英文写成的九部书中，除《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外，《社会学方法》^③、《社会行动》^④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最具持久不衰影响力的几部书。

虽然这些著作，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在某些方面对现代读者来说不免显得有点过时，但在重读它们时，大部分内容给人以深刻印象，在

① 有关传说材料与参考书目主要取材于海伦娜·洛帕塔 (Helena Z. Lopata) 教授——她是兹纳涅茨基的女儿——为她父亲的遗著《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Roles*,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65) 所作的序言。

②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5 Vols, Boston: Badger, 1918—1920)。

③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4.

④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6.

经受住时间检验的程度上尤其令人惊讶。比如,早在三十年代初,兹纳涅茨基在研究社会角色概念时就采用了精致复杂的方法,这应使那些认为社会角色概念是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最早于一九三六年提出来的学者们惊叹不已。^⑤

兹纳涅茨基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应该集中精力研究行动者赋予情境的主观意义,行动者在情境中发现自身。有人推测,由于兹纳涅茨基早期对于社会价值的调查研究,即使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似乎要统治社会学领域时期,他仍坚持认为,“科学家要想以归纳法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把这些行为看作人类对于那些作用因素与被作用因素的经验过程;这些因素是科学家的经验材料,只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他们的”^⑥。在兹纳涅茨基看来,文化材料有别于自然材料,因为后者独立于人类行动的经验,而前者具有“人类相关性”(humanistic coefficient)。在强调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观意义、目标搜索和人类行为者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这一点上,早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行动的结构》^⑦得出类似结论之前几乎二十年,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就作出了恰如其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兹纳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面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尔泰(Dilthey)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传统。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兹纳涅茨基和托马斯熟练地利用了詹姆斯(William James)、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杜威(John Dewey)和库利(Cooley)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成果。他们两人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中资料整理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成为当代研究与理论的基础。

⑤ 林顿:《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36)。

⑥ 《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s*),第11页。

⑦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第1版, 1936年。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充分运用了作者过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点不同。这本书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社会学分支大致可以定义为研究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〇年兹纳涅茨基出版此书时,美国社会学刚刚开始吸收二十世纪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早期马克思和迪尔凯姆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也开始对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⑧

虽然知识社会学的鼻祖或许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和十八世纪 xii
的法国哲学,但系统的知识社会学却植根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的迪尔凯姆传统。

为了把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倒置过来,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相反,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⑨,马克思提出了思想领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马克思断言,某一时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条,必须在最终的分析中被理解为其拥护者阶级地位的表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曼海姆开始自觉地把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加以阐述时,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传统之内,尽管他实际上还受到了德国历史学、现象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但他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有别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追溯观念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作为挫败敌手主张的论战性武器,曼海姆却力图使

⑧ 对知识社会学史所作的更全面介绍,请参见L.A.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科塞与伯纳德·罗森伯格(Bernard Rosenberg)著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Macmillan, 1957);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Kerr, 1904),第11—12页。

知识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分析工具。他主张,所有观念(不仅是敌手的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事实上,每一位思想家只从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专门的社会角色,因而必然影响他据以探讨经验世界的观点与洞察力。所有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说相互决定。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现代世界舞台上各种相互斗争的观念,都表达了各自群体和阶级的愿望。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

xiii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德国创始人马克斯·舍勒,只是在表层结构上受到了马克思传统的影响,而曼海姆却如此广泛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舍勒是现象学学派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位异端分子,因而,他感觉到在观念产生过程中预先设置阶级因素是多余的,他反对这样做。相反,他认为,用常驻不变的独立变量(如阶级地位)不可能说明可变的各种观念的出现。舍勒说,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决定着特定思想产物的出现。在现代社会,阶级因素的确若隐若现,血缘关系曾经是原始社会的独立变量,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曾经处于中心地位。进而,舍勒认为,以前的理论建立过程中相对主义过于泛滥,他也反对这么做,他试图采取一条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断言,虽然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但所有这些观念只不过是向永恒的柏拉图王国中不变的绝对本质投以一瞥而已。

在关于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曼海姆与舍勒各自构成了重要部分。相比之下,作为法国知识社会学先驱的迪尔凯姆,关于这一课题所论不多。迪尔凯姆的著作带有模糊不清的认识论思辨,因此比德国人受到更多的诋毁。尽管如此,必须认为,迪尔凯姆的著作是此领域中最关键的开创性研究之一。

在他继续向对社会行为作心理学和原子论解释开战的过程中,迪

尔凯姆走进了知识社会学领域。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和宗教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并把道德、价值和宗教解释成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而不是个别思想家沉思的产物。迪尔凯姆并不满足于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观念系列追溯到社会历史环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张,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时空概念,是社会创造物,以此力图推翻康德所强调的不变的、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迪尔凯姆断言,社会通过形成逻辑思想据以产生的范畴而在逻辑思想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他认为,对原始人进行时间上或其他的分类,非常接近于对部落的社会组织所作的分类。第一个逻辑类是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中的其他物体,按照部落属性、血统或家族群体加以分类。年代划分对应于周期性的节日和公众仪式,以便让日历能表示集体活动的节律性。按照类似的方式,社会组织一直是空间表征的模型,而天国只不过是它的尘世伙伴的一个投影。在迪尔凯姆看来,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xiv

如果有谁想探讨一下兹纳涅茨基这本书的所有思想先驱,那么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成果,这些成果也对三十年代后期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社会学作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然而,在这里我乐于指出(即使最粗略地),他的前驱者的研究方法为兹纳涅茨基设置了一些陷阱。

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多数先前的理论建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假设强烈地干涉据称是社会学研究的实质性领域。当知识社会学想把自身变成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时,兹纳涅茨基有正在闯入禁区之感。“作为知识的理论,‘科学的科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社会学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的特征”。¹⁰不应该把知识社会学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认识xv

¹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页。

论,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属于社会学领域。虽然兹纳涅茨基没有专门论及这一点,但人们可以猜测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先驱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也许少许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曼海姆的普遍相对主义或关系主义,明显在把自己引入困境。正如古代克利特岛人,他们声称所有克利特岛人都是撒谎者,这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自己之陈述的真理价值。曼海姆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主张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决定,那么,这一主张也要应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上去。人们一再同他争辩,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试图在经验性社会现象的世界之外采纳阿基米德的观点,以便能对“所有思想都由社会决定”发表论断。曼海姆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并想方设法克服之(没有完全成功)。在某些后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坚持认为,存在的命题导致无效判断,而只是强调给定的视角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从而避免了早期立场中的困难。他还更进一步抛弃了早期在理念王国整体决定问题上提出的多余主张。他较为谦逊地说,“在社会科学中,与其他地方一样,判断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可以在对客体的研究中找到,而知识社会学无法替代”,“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①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了发生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使观念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依赖于社会地位。这种情况有助于曼海姆后期的学生(兹纳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经验证实的部分,与相当不幸地侵入认识论领域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曼海姆存在的问题,更有理由在迪尔凯姆和舍勒身上存在。舍勒关于永恒本质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谈不上科学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识社会学中没有什么地位。迪尔凯姆试图推翻康德的主张,照样会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学氛围,传递给真正的知识社会学方面富有成

^①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第4页。